

论我国农业的波动与出路

UNSTABIL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SOLUTION

牛若峰

与制造业相比，农业是一个发展缓慢和稳定性较差的部门，除了受土地、气候、生物机理的制约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人类行为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农业波动不能不通过历史的长过程来考察人类行为因素的作用，从而揭示农业波动的规律性，找出根源，指出出路。

一、阶段性波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较少，经济落后，效率低下，国民收入很低，吃饭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建国以来，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我国基本上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农产品总量很大，居世界前列，而人均占有量却很低，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尤其是粮棉人均占有量，波动不稳（见表1）。

表1 我国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变化情况(公斤)

年	1949	1952	1957	1962	1965	1975	1979	1984	1985	1988 ⁽¹⁾
粮 食	209	288	306	238	272	309	342	396	372	359
棉 花	0.8	2.2	2.6	1.1	3.0	2.6	2.3	6.1	4.0	3.8
油 料	4.8	7.4	6.6	3.0	5.1	4.9	6.7	11.6	15.2	12.0
猪牛羊肉	—	6.0	6.3	2.9	7.7	8.7	10.9	15.0	16.9	20.0
水 产 品	0.9	3.0	4.9	—	4.2	4.9	—	6.0	6.8	9.5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及其他有关文献

(1) 按 198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如果把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状况用曲线表示（图1），就会发现：由恢复上升—跌落式倒退—调整回升—停滞与徘徊—再调整回升—新的停滞与徘徊等几个时期构成阶段性波动，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波动的每个阶段都有数年的连续性，但在时段上没有严格的周期规律。我国农业波动频率高，幅度大，为世界所罕见。

1952~1987年间，平均波动幅度为10.2%，比

美国农业平均波动幅度高出1倍，而且峰值与谷值的最大差值很大，农业总产值的最大差值为28%，粮食和棉花总产量的最大差值分别为26%和98%。从图中分析，40年来，我国农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57年），农业迅速恢复和较快增长时期。8年间，政策对头，措施得力，环境对农业有利，因而全国农业总产值比基期增加

85.3%，年均增长 8%；粮食总产量增加 8 124 万吨，年均增长 6%；人均粮食占有量由原来的 209 公斤增加到 309 公斤，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高的 1936 年高出 10%。虽然粮棉油等开始实行定量供给，但是农产品供应与当时人民的购买力基本协调，物价稳定，社会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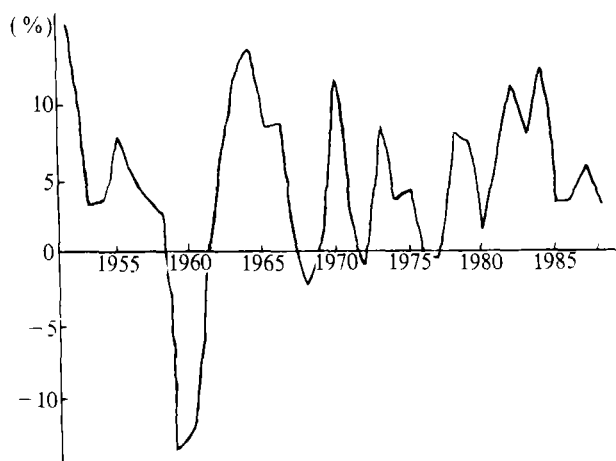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农业总产值波动曲线

第二个时期（1958~1966年），农业下降和再恢复时期。这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急剧“左”倾。农业生产，1958年粮食丰收后的“大跃进”变成了大倒退。196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19.9%，年均下降4.3%，粮食总产量低于1952年的16 392万吨，油料和肉类等总产量下降到1949年水平以下。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到238公斤，比1957年低68公斤，减少22.2%。食物供应全面紧张，票证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困难，贫困和饥饿到处可见。1963年开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使农业得到迅速恢复。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加37.2%，年均增长11.1%，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大体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农业受挫后出现的首次高速度恢复性增长。

第三个时期（1966~1978年），是农业徘徊和停滞时期。十年动乱把“左”倾路线和“左”的政策推向极端，12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仅增加45%，年均增长3.1%；粮食总产量由原来近2亿吨增加到3亿多吨，增长56.67%。但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占有量在300公斤上下徘徊，其他农产品人均占有量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直到70年代末，全国仍有1亿多人口不得温饱。

第四个时期（1979~1984年），这一时期纠正

了“左”倾路线，并对经济发展政策和农村政策作了重大调整。6年间，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协调，农业出现连续高速度增长。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4%。种植业年均增长6.7%。畜牧业年均增长10.7%。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总产量增加1/3以上，增加了1亿吨，1984年达到40 731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6公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棉花等其他农副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长。

第五个时期（1985~1988年），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和徘徊。对农业连续六年高速度增长作出过分乐观的判断，引出了一系列抑制农业的错误政策，农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急剧恶化。1985年粮食减产7%，产量减少2 800万吨，是历史上减产幅度最大的年份；1986~1987年稍有恢复，1988年粮棉油三大产品全面减产，粮食减到39 615万吨，比1984年低2.74%。四年来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一直在1984年水平下徘徊，四年没有完成国家农业计划。同期，人口增加6 000万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比1984年减少37公斤，即下降9.34%，供需矛盾又趋紧张。

上述几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上下波动，反复证明了政策和环境有利时农业就上升增长，政策和环境不利时就下降或停滞。人们对前29年各时期农业升降及其原因分析或许没有分歧，但对近十年农业升降的原因持有不同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1979~1984年我国农业连续高速度增长是“超常规增长”。其实不然，这六年农业高速度增长，是对工农业比例关系作了暂时性调整和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性改革（尚未触动指令性计划体制和统派购制度）的环境中，在一系列利农政策保护下，凭借传统技术，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以高成本为代价实现的补偿性粗放型增长。主要的利农政策和有利条件是：（1）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2）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3）进口了大批粮食，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4）大幅度增加化肥、柴油、农电等物质投入；（5）农业基本建设长期积蓄的能量得以释放。因此可以说，这几年农业的高速度增长与1963~1965年的高速度恢复有一定相似之处，是阶段性波动长过程中出现的一次补偿性和恢复性上升，并未超出我国农业发展的常规。

同样，有充分证据表明，1985年以后我国农业也没有象有人说的转入“常规增长”。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人们头脑开始发热，对一度出现的“卖

二、重工业偏斜发展是农业长期波动的根源

粮难”的暂时性、局部性和结构性认识不清，过分夸大虚假过剩的压力，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和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以为农业从此可以自力发展了。从而导出了一系列抑制农业增长的政策和措施：(1) 大幅度减少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1985 年比 1979 年减少 36.3%，下降到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3.4%，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2) 农产品合同定购价格选择失误，不仅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而且也低于原统派购价、超售加价和议购价的混合价格，使粮棉生产受挫，尤其使潜力较大的新粮产区受挫；(3) 农用生产资料普遍多次涨价，农业成本显著上升；(4) 水利设施失修，灌溉面积减少，抗灾能力下降，物质投入减少，增产科技没有新的突破；(5) 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粮食处于最不利地位。这样，农业出现新的停滞和徘徊就是很自然了。

有一种观点，把 1985 年以来几年农业滑坡说成是市场机制诱发的“周期性波动”。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1) 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农村市场更是发育不良，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宏观环境的限制；(2) 农产品自给性很大，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商品部分受到旧的流通体制和强制性低价合同定购政策的制约，农产品供求还不是按照市场要求规律运行；(3) 农产品购销引入市场机制时间很短，且带有局部性，并没有形成市场需求周期，而波动最厉害的恰恰是国家控制很严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产品。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周期性波动与我国农业的阶段性波动，形成机制是有区别的。

目前，许多人正在研究我国农业波动的原因。据认为，我国农业用地和劳动力投入量变动缓慢，两者的变动与农业波动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自然灾害对年际间的产量变动虽有显著影响，但从长远比较看，丰、平、欠相抵，自然因素对农业波动的影响也不很明显。有人分析表明，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总产量升降的影响幅度大约在 $-4.7\sim 3.9\%$ 之间，1950~1986 年间，粮食因气候影响而减产和增产分别相当于同期粮食累计总产量的 0.82% 和 0.84%^{*}。至于科技进步的作用，则许多研究证明，在有利政策和正常自然条件下，它可以促进大幅度增产，而在不利政策和较差的自然条件下，它可以部分减小不利因素的影响。

据我们研究，农业阶段性波动的主要引发因素是政策变动。在我国，没有稳定的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农业政策，因而也就不会有农业的长期稳定增长。每一次国家经济政策变动都转化为经济的涨落，农业波动是政策波动的直接结果。在政策因素中，对农业波动影响最大的是投入政策的变动。据有人分析，1953~1986 年间，国家对农业投资平均波动幅度高达 93.7%，全部农业投资平均波动幅度为 31.3%^{*}，比农业生产波动幅度高出两倍，这是造成农业阶段性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动对农业波动的影响也很显著。可以说，灌溉面积的增减，化肥投入量的升降，自然灾害成灾率的高低，都与投入政策和价格政策密切相关（见表 2）。

表 2 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

年 份	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比率	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平均增长率	灌溉面积年平均增长率	化肥用量年平均增长率	自然灾害年平均成灾率 ^①
1952~1987	7.8	3.69	2.31	17.17	3.90
其中，1970~1978	10.2 ^②	1.36	2.395 ^③	12.16 ^④	29.86
1979~1987	4.3 ^⑤	7.9 ^⑤	-0.001	9.49	46.2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1988年，①自然灾害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②1971~1980年数字，③1965~1978年数字，④1981~1987年数字，⑤主要是1979~1980年调高了收购价格

政策变动造成农业波动，而政策波动则根源于经济发展战略，即重工业偏斜发展战略，由此可以说，后者是农业阶段性波动的根源。在国家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是必要的。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实现国家工业化，我

们在世界上就站不住，也不可能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物质技术条件。为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

* 陈红雨等：《对农业波动的认识》，见1989年2月21日《经济日报》第2版。

内,靠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金积累,从根本利益上说,是完全必要的,不容置疑的,没有别的选择。但问题是,以“工业为主导”演变成了重工业偏斜发展和城市偏斜政策,持续时间太长,挖得农业太苦,严重损害了农业这个基础,致使工农业两大部类和城乡的发展长期失衡。表现为:

1. 工农业利益失调。国家取自农业的过多,用之于农业的太少。1952~1986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通过税收又拿走1044.38亿元,合计6868.12亿元*,超过1987年国营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8.5%。剪刀差绝对量最大的1978年达364亿元,比1952年增加3.9倍,相对量从17.9%增加到25.5%。**这就是说,1978年农业新创造价值的1/4以上流入了非农业部门。而国家在1952~1983年间通过各种渠道对农业的投资和农村社会救济合计才2326.09亿元,只抵国家从农业拿走的1/3。从表面上看,工业提供的利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剪刀差从农业转入工业的。实际上农民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要占1/3以上,例如1982年占到37%。这和农业劳动者平均资金占用量不及工业劳动者的1/10,大体上是相当的。

2.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失调。1952~1985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51.2%用于工业,主要是用于重工业(35.7~54%),而农用工业只占4%,1981~1985年下降为1.3%,1987年回升到3%。同期,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仅占8.9%,80年代中后期连续下降,由占5%下降到3.4%,绝对额也大幅度减少。由于国家长期执行重工业偏斜投资政策,加以农业自身积累有限,造成社会固定资产占用偏斜,农业只占21.7%。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固定资产占用量只有工业的1/12,全额资金占用量也相差过分悬殊。70年代末,苏联工农业劳动力平均资金占用量大致相等,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资金占用量超过了工业部门。

3. 工农业发展速度失调。据统计,1952~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加15倍,农业总产值仅增加1.3倍,累计总产值增长比率为10:1。几十年间,只有两个调整时期(1963~1965和1979~1984)农业增长较快,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比率分别为1.6:1和1.5:1;1958~1962年,工农业俱伤,年均增长速度比率为3.8:-4.4;十年动乱时期工业保持了较快增长,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比率为

3:1。三个时期或年份(1952~1957、1985~1987和1988)工业增长过快,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比率分别为4:1和近7:1,后者表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4. 形成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建成了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农村仍然是靠传统技术进行生产的农业社会。工农业两大产业结构比率由原来的3:7变成了7:3,但城乡人口和劳动力总数之比仍为2:8,与建国初期大体相似。国家从农业拿走了巨额积累,而大量人口和劳动力却滞留农村,这是我国农业落后,效率低下,农民受穷的根源。城市利益受到国家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的保护,越发造成城乡壁垒,工农利益矛盾尖锐。

只要重工业偏斜发展战略不改变,国民经济就要按照偏斜轨迹运行。一开始重工业优先,农业被置于为工业化服务的从属地位。国家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和农产品收购政策,都为了保证工业高速增长。宏观环境越来越对农业不利,农业由低速增长转为停滞或下降。偏斜加剧到一定程度,工农业矛盾激化。一方面,工业增长过快,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致使材料、原料、能源全面紧张;另一方面,农业过冷,下降,停滞或徘徊,农产品供求矛盾突出,不能承受大工业偏斜发展的重负荷。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瓶颈。再继续偏斜运行,经济就要崩溃。于是调整经济,对工业偏斜进行局部性矫正,暂时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刺激农业发展。经过调整,农业出现数年的增长,农产品供应状况明显改善,工业发展潜力重新增长。于是又重新转向工业偏斜发展,进入下一个偏斜循环,周而复始。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强烈的赶超愿望,因而有对速度和数量的偏好。为了保证庞大的工业体系“正常”运转,只能牺牲农业利益,总是把握这样一个限度:使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积累,使人民能够吃饱饭。领导人对“农业是基础”,大概就是这样理解的。然而,农业长期波动却直接影响了工业的稳定增长。农业波动经过工业而放大并有滞后作用,使得轻工业、整个工业和社会总产值平均波动幅度分别高达23.9%、29.3%和22.8%,比农业平均波动幅度高出2倍多,因而国民收入也长期波动不稳(见图2)。无论50年代的“跃进赶超”和十年动乱中的“全面备战”,还是80年代从产值翻

* 陈家骥:《对我国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研究》,见《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

** 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番到“经济过热”，一个共同特点是人治决策。这种决策机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急于求成，总是唯一正确，无选择余地，也无法律约束。“一刀切，一阵风”是常见现象，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代价是高昂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大跃进”的经济损失为1200亿元^{*}，十年动乱的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两项合计相当于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倍和国民收入的两倍。急于求成和被迫调整，一进一退，损失也不是小数。只顾当前速度要快，追求数量膨胀，忽视长期性和基础性速度，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看来，建国40年了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怎样领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更没有认真吸取历史的和国际的经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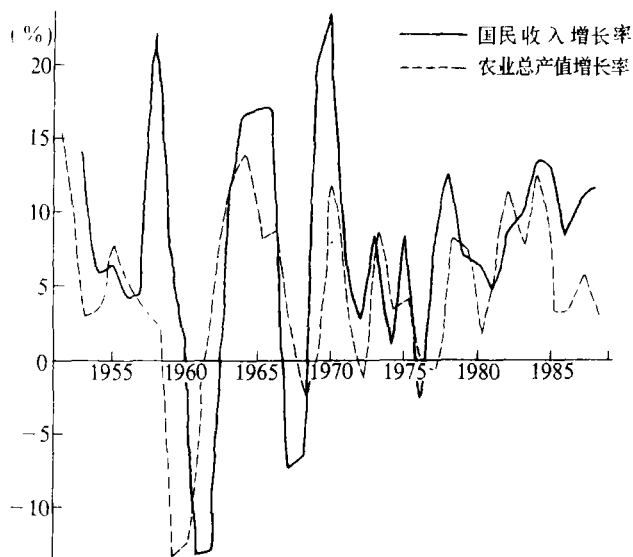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农业波动与国民收入波动相关曲线

三、矫正偏斜战略是农业转向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

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是重工业偏斜发展和城市偏斜政策长期积累而成的经济社会“综合症”，因此必须从矫正偏斜中找出路。

1. 要正确地认识农业问题。这里要把握如下基本点：

(1) 供应短缺是长期趋势。人口增长需求和收入增长需求的双重压力与日俱增，有超过粮棉年均增长的势头。食物消费带有不可逆转性，一旦达到某个水平，就不能降下来。这是社会需求的发展规

律。因此，解决农产品短缺，不断增加有效供给，到本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应当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总目标和农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2) 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资源环境条件仍在恶化，潜伏着危机。城市外延规模无限扩大，一些地方农村城市化盲目发展。流通领域漏洞极多，中间环节繁多，获利过多，出现了合同性经商热。社会上“拜金现象”成风。粮食主产区的低收益产品生产开始萎缩，变成了缺粮区。

(3) 农业是为社会提供物质生活第一需要产品和原料的公益性部门，占用劳动力多而生产率低，需用固定资产多而利用效率低，生产周期长而资金周转慢，产品价格低而盈利少，因而积累率低和自力发展能力差。为此，国家、地方和全社会投资举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江河，发展农业科技和教育事业，是必需的，也是应该的。

(4) 现代化的农业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我国人口众多，缺口很大，支付能力有限，指望大量进口粮食来解决10多亿人的温饱问题，是不牢靠的空想。从根本上说，解决供需矛盾应当立足于发展本国农业，增加有效供给。

2. 矫正偏斜战略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主要标志是：(1) 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2) 工业拥有庞大的固定资产和雄厚的科技队伍，足可以实行集约经营；(3) 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为国家工业靠自身积累求发展提供了先例，创造了经验；(4) 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不会出现工业品过剩危机；(5) 基础脆弱的农业再也不能承受重大牺牲，迫切要求和支持经济战略的调整。

3. 矫正偏斜是要求把工业农业放在同等地位，两者协调发展，平等交换，互相促进，共同增长。

(1) 调整工农业发展速度，使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比率保持2:1左右。(2) 调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使农业投资占到11~12%，逐步增加到18%左右（1963~1965年调整时期曾占到17.7%），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江河治理。(3) 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逐步做到等价交换。

(4) 把农村工业化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对待，为城乡工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并制定农村产业发展纲领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中长期规划。(5) 国家工业要由粗放经营

^{*} 江泽宏著：《比较经济学导论》，复旦大学1988年版第145页

转向集约经营,追求效率和质量,靠自身积累发展内涵扩大再生产。

4. 调整工农业利益关系是一个艰难的长过程。要研究采取怎样的速度和操作步骤,才能获得最大整体效益。为此,要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的设计,防止急猛和矫枉过正。第一步,只能在现有经济格局内进行微调,以增加农业投入为主要措施,辅之以减少农产品合同定购量,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缓和工农业利益矛盾。第二步,以调整合同定购价格为主要措施,基本做到等价交换,从根本上矫正偏斜矛盾。第三步,国家全面转向以工补农,使利益关系开始向农业适度偏斜,以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随着农业向现代化转变,农业内生资源的作用相对缩小,而外生资源投入的作用则相对和绝对地增大,因而农业对工业的依赖就越大。

5. 矫正偏斜要与体制改革和基础建设配套进行。在改革与发展的年代,矫正偏斜不能单独进行,要纳入中长期改革战略规划和近期改革计划。

(1) 改革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发展商品经济体制,真正确立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确保农业经营利益。一是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逐步缩小剪刀差,二是调整农产品内部比价,重点支持大宗短线产品的发展。

(2) 国家要制定农业投资法和产品贮备法,各

层次都要建立农业发展调节基金和粮食安全贮备体系。国家和地方手里掌握实实在在的调节手段,才能有效地支持短线产品的生产,做到丰收时购得进,存得下,少降价;欠收时抛得出,供得上,少涨价。

(3) 深化农村内部改革,明确集体层次、农户和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它们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承包、租赁关系。

(4)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建立农民利益代表机构,例如各层次的农民协会和行业协会。

(5) 建立农村教育基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国家地方和全社会都有责任对农民进行智力投资,发展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教育。要改善农村教育结构,重点改革中学教育,着重发展中初等职业教育,同时加强成人职业培训。改造传统农业关键在于改造农民,用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观念改造农民。

矫正偏斜,改革与发展,都应当有法律保证。科学、民主与法制,以法治国,以法治工,以法治农,以法治商,是我们民族复兴和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

本文作者牛若峰(*Niu Ruofeng*)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邮售《航空机械失效案例选编》

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装备失效分析中心主编的《航空机械失效案例选编》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统一书号 ISBN-7-03-001126-0/O·260。本书收集了建国以来因航空装备失效引起的重大飞行事故及典型失效件的分析结果。这本书还从另一个角度记述着我国航空工业走过的艰难历程和付出的巨大代价。它包含着丰富的学识与深刻的经验教训,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和学术水平。

在本书的案例中,有事故前景情况介绍,有试验方法与分析思路,有宏观与微观照片,有试验数据,对每一案例的失效模式与原因,从理论上给予了深刻的分析,结论准确,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与预防措施,文字简练、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可供航空航天、机械电子及冶金等行业从事设计、科研、教学、生产制造,使用维修和管理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借鉴、参考。

本书为16开精装本,全部用105克进口铜版纸印刷。全书共320页约45万字,图片500余张。每册定价27.50元(包括邮费)。

《科技导报》读者服务部办理邮售业务,欲购者请从邮局将书款寄到:

100081 北京海淀区大慧寺19号

《科技导报》读者服务部

并请注明收书人的邮政编码详细地址及姓名,以便准确、及时给您寄书和报销凭证。